第44卷 第6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4, No.6
2007年11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07

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解析

曲景毅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曹操作为建安文坛和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其文学成就被后世所认可。然钟嵘《诗品》却将其列为下品，引发后代诗评家的许多争论。本文认为钟嵘在"风力"与"丹采"二者之中更重视后者，曹操诗却不符合这一标准；钟嵘评诗"止乎五言"，而曹操诗歌成就主要在四言诗；曹操五言诗均属乐府诗，尚属"汉音"，不是钟嵘关注的文人五言徒诗；后代对曹操的接受是一种非纯文学的接受，曹操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从事文学创作，其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政事所掩，这也是其文学家身份并不为钟嵘所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后代对曹操诗的等级品评有非议的属于少数，从而也反证钟嵘的品评在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眼里是受到认可的。

关键词：曹操；《诗品》；五言诗；文人诗；接受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6-0088-06

一

关于钟嵘品第之不公，学术界多有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陶渊明位列中品的讨论。而对于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前人虽有所论述，似未有专门文章予以纵深解析。

讨论曹操屈列下品的声音是从明代才开始的。王世贞首倡其端，其《艺苑卮言》卷三云："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也持类似观点。至清代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云："'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此外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一、吴德旋《杂著示及门诸子》一诗均为曹操鸣不平。这种声音至近现代仍有嗣响，如陈衍《诗品评议》、钱锺书《谈艺录》、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等等。

钟嵘《诗品下》评曹操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前人论及曹操位列下品时，会说曹操诗不符合钟嵘的审美标准。这种解释流于表面，读《诗品》时我们并未发现曹操的古直、悲凉的风格与钟嵘所欣赏重视的风格有很大的龃龉。

"古直"，即古朴直率。钟嵘曾不满于"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称赞应璩"善为古语"，陶潜诗"笃意真古"，阮瑀、欧阳健等七位诗人"不失古体"，张永诗"颇有古意"，说明其对古朴诗风并不持否定态度。钟嵘主张"直寻"，对于当时作诗拘限声病的风气十分反感，他认为过分的雕琢只会损伤诗歌的"真美"。

钟嵘同样认可"悲凉"的诗歌审美风格，如评古诗"意悲而远"，评李陵"文多凄怆"，评王粲"发愀怆之词"，评阮籍"颇多感慨之词"，这是当时评论家对于时代特色的共识，只是钟嵘似乎不像刘勰那么强调"慷慨"而已。

所以读这两句关于曹操的评语，可以感觉出钟嵘对曹操没有什么贬义，正像其对陶渊明也同样没有贬词一样。

钟嵘评价任何一位诗人，均非随意褒贬，而是以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标准作为依据。他把自己的恩师王俭置于下品，把许多皇帝置于下品，足见其划分没有什么身份等级差别。后世的看法与其有距离，乃是文学发展变化的结果，我们应该把《诗品》放在产生它的那个特定时代里去考察。诚如许多研究者已指出的，钟嵘的诗歌审美要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而且在"风力"与"丹采"之中，更看重的是"丹采"。

收稿日期：2007-03-15
作者简介：曲景毅，男，天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其实不仅是钟嵘如此，这乃是时代使然，注重文学性和追求形式美是钟嵘和萧统等一代诗评家的普遍认知标准。魏晋以来，诗坛一直涌动着一股尚巧尚丽的风气，鲁迅先生评价汉末魏初的文章特色时有"华丽"一点指此，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也指此。钟嵘列曹植为上品，说其"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但其实更看重其"辞采华茂"的外表，他把陆机、谢灵运列入上品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反观曹操诗，是显然不符合"润之以丹采"这一标准的。

建安时的曹操与曹植正好比晋宋时的陶渊明与谢灵运。曹操与陶渊明以古质为本，曹植与谢灵运以华美见长，故在钟嵘重形式美的眼光的审视之下，自然品第高下有别。

二

那么，用上述诸如普遍的社会风尚和重形式美的评价体系来解释曹操位列下品，是否将问题解释清楚了呢？我以为，未必然。因为如果单以重丹采来解释钟嵘的等次品评，又如何看待他虽认为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左思"野于陆机"，却仍列其入上品呢？所以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解析。今不揣浅陋，试举一些其他原因。

（一）曹操诗以四言诗见长，钟嵘乃评五言诗，故认为曹操诗五言为下品。

钟嵘的评价体例中有一句话不容忽略，即《诗品序》所说"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人殆集"。钟嵘是以五言诗评论等第的，而且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反映诗歌发展的全貌，网罗所有的优秀诗人。他评价的诗是不包括四言、七言和杂言诗而只是针对五言诗的。当然五言诗中包括一些优秀的五言乐府和五言歌谣[1]113-121。《诗品序》云："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五言诗表现力的优越性是钟嵘只评五言的原因，他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其他诗可以置而不论。

曹操的五言如《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反映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动乱现状，格调苍凉雄浑，得到了后世诗评家的充分肯定。《薤露》被沈德潜称为"汉末实录"，《蒿里行》开创了"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先河，《苦寒行》"格调古朴，开唐五言之端"（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但是，汉末魏初是一个"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的时代，曹操的这些五言诗古朴质直，直抒胸臆，受汉乐府民歌影响较大，与同时代诗人的五言诗相比，这是较为特出的。而且其五言多用赋体，不符合钟嵘重比兴的标准，故将其列置下品，也是很自然的。明人许学夷虽对钟嵘《诗品》关于曹操的定品有疑议，但他也认为"孟德《薤露》、《蒿里》，是过于质野"（《诗源辩体》卷四）。翻查后人对于曹操诗的评价，毁誉虽然参半，但最看重的并非其五言诗。

曹操以四言诗见长，诚如林庚先生所说，"以古为新"，在同时代四言诗中是"最突出也是最好的"[2]116。对此前人也有类似看法，如吴乔《围炉诗话》卷二云："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陈祚明《采菽堂诗集》卷五云："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明清以后对于曹操诗的评价很高，但是许多都是针对其诸如《短歌行》、《观沧海》、《步出夏门行》之类的四言诗。四言诗常用来述志，并不是一般文人常用的抒情方式，不是钟嵘所称赞的"有滋味者"，曹操作为汉末枭雄，四言诗是很好的抒发其政治理想和个人志向的工具，这在曹操是一举双得，然而对于诗评家的钟嵘来说，以"止乎五言"的标准评诗时，曹操的这些四言诗是不被列为考察对象的。

（二）曹操诗尚属"汉音"，属于乐府古诗，曹丕曹植诗已属"魏响"，进入文人诗范畴。钟嵘以文人五言徒诗的标准来衡量曹操的乐府五言古诗，不会把它放在太高的位置。

曹操诗表现了他个人将乐府诗向文人诗转化的努力。林庚先生指出："建安时期还是在从乐府诗转向诗人的诗的开端，而曹操就是最初以大力来推动的一个人。"[2]113而且曹操对于诗风是有开风气的突出作用的，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曾从创业之君的角度，认为"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开启魏诗风气。我们认为曹操的这种古朴直率、慷慨悲凉的乐府歌诗是建安风骨的最典型代表，这一点连曹丕、曹植、七子也难与比肩。

但是,曹操的诗几乎都是乐府,五言诗中有名的《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三首诗题均来自乐府曲调名,《蒿里行》、《薤露行》属《相和歌·相和曲》,《苦寒行》属《相和歌·清调曲》,汉乐府民歌的特点很突出。故王世贞说他的诗"自是乐府本色"(《艺苑卮言》卷三)。

曹操五言诗尚为"汉音",即仍属乐府诗范畴,是"用古乐府写实事",并不是真正的文人诗,而钟嵘在评诗时是以文人五言徒诗为标准的。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张玉穀《论古诗》四十首之十六:"老瞞诗格极雄深,开魏犹然殿汉音。文帝便饶文士气,《短歌》试各百回吟。"(《古诗赏析》卷首)黄侃《诗品讲疏》也称曹操诗"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这里需注意的是,诗评家并不是要有意地区分所谓"汉音"与"魏响",汉诗与魏诗在诗史上也并非泾渭分明。其实诗论家是重在区别乐府诗与文人诗。曹操诗均是乐府诗,他写诗有着较强的言志目的与政治宴会的实际需求,其诗当时都用来配乐演唱,是其政治交际的一种工具。《诗品》的评价对象均是文人五言徒诗,重视诗歌本体的艺术表达能力,与能否入乐演唱无关,与是否有政治功能更无关。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就不是"汉音",即已不是乐府诗,它们是汉代文人五言徒诗的典型代表,故钟嵘将其列入上品,由此也更好理解上述诗评家"汉音"与"魏响"的确切含义。

从文人五言徒诗的角度,曹操的五言诗毕竟只是向文人诗转化的开端,其诗依然古风古韵,古诗的味道更浓一点,文人的味道较淡,所以钟嵘对他的评价不会过高。以读文学史简单的印象感知而言,开创者固然会得到后世的肯定,但相对于后来发展的高峰来说,还是显得粗疏了一些,直白了一些。陈祚明《采菽堂古诗》卷五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孟德欲为三代以上之词,劣乃似汉。"就是认为曹操位列下品实有不公的批评家如许学夷、钱锺书、王叔岷等人,也指出"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而曹操"古直苍浑"、"不合于南朝好文之习"、"无丹彩可言,与南朝风尚迥不相谋",这是其位列下品的重要原因。所以,主要是乐府诗的曹操,作诗不假雕琢,有时过于质朴,文人诗的倾向不明显,尚属于汉音,难以在跟众多文人气较浓的作家群的比较中处于上风,钟嵘将其位列下品,是有道理的。

汉末魏初,文人创作意识的觉醒导致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从简朴到华丽、从古直到雕琢正是判断文人创作自觉的标志。曹操与曹丕、曹植、建安七子的区别正在于此。

(三)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对其文学接受是有较大影响的,其文学成就往往为其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所掩盖,超出文学的接受行为颇为常见,接受者在接受文本的同时往往着眼于社会政治历史的评判,读者接受其文学作品时心态也是很复杂的。政治家的文学接受史既是其文学作品接受的历史,也包括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评价的历史,这是一种非纯文学的接受①。

曹操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代表。王世贞认为其"山不厌高"(《短歌行》)、"老骥伏枥"(《龟虽寿》)可以接续《垓下歌》、《大风歌》之"描写帝王兴衰气象"(《艺苑卮言》卷二),并认为唐太宗诗语输给曹操,明太祖"长歌短篇,操笔辄韵,有魏武乐府风"(《艺苑卮言》卷五),从帝王言的角度认为其符合宏大气象。周履靖、陆时雍、徐世溥、沈德潜等均大力肯定曹操诗雄浑苍健的气象,这些评价都与其曾是魏代实际开创者的政治身份紧密相联。张溥《魏武帝题辞》云:"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然曹氏称最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之五云:"魏武雄盖一世,横槊赋诗,其所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夺汉家两风之座。"吴氏将诸葛亮与曹操并称三国两位"多才多艺之士",所作均精妙,"然武侯有才,用向圣贤一路去,故人重其德而掩其才;武帝有才,走入奸雄一路去,故人厌其德而弃其才。"他认为曹操的作品,"自足千秋,非以人传"。在分析其《短歌行》一诗时,批云:"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思其与天下贤才交游,一定有一段缱绻体恤情怀。观魏武此作,及后

① 参阅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2页。

《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能够看到曹操重才爱才，对人真诚的一面。曹操诗也确乎以其真淳古朴的格调打动了后世许多读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云：“魏武终身攻战，何暇学诗，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认为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以余事写诗能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但是另一方面，曹操一直遭受着“汉贼”的非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其诗的评价，关于此点，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论述。

曹操作为汉末动乱时期的风云人物，他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被认知的，他对曹魏政权的建立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后来正式称帝的曹丕。后人对曹操诗的接受往往与对其人的接受交融在一起。曹操更多地是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其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事所掩，这是其文学家身份并不为钟嵘所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史中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帝王将相的文学成就经常会受到其政治功业的遮掩和影响。

（四）我们在考论品次差等时，也要考虑作品散佚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云：“近时王士禛极论其（曹操）品第之阐多所违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如果我们单以现今留存的诗歌来对钟嵘品第进行优劣评价的话，难免有失公允。特别是曹操的创作自唐代以后遗失极多，明人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还曾说：“自汉以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曹操的著述是相当丰富的，但是留存下来的却少之又少，难以看到其创作的全貌，而钟嵘却是应该可以看到的。从这一角度而言，遽加贬责钟嵘的品第也是不恰当的。

三

文学史上诸如曹操这样的人物，他的人品与文品经常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诚如蒋寅先生在《文如其人？——诗歌作者和文本的相关性问题》一文中阐释，我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认可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即文如其人是如人的气质而非品德，是文与人的气质一致，而非与人的品德一致。”[3]193—194曹操就是如此，他的诗与其个人的气质相类，并不是与其人品吻合。但曹操的人品在后代多为人诟病，封建正统观念对其是与非的评价对钟嵘的品评是有影响的。梁代偏安江左，人们对于曾是汉末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是有非议的，认为其并非正统，表现在诗歌品评上也是如此。

下面以晋以后对曹操的接受实景证明上述观点。两晋时人对曹操的功业给予较高评价，这恐怕主要是因为魏晋时代不远，且魏晋间政权交替，贬魏不利于晋的缘故。尽管尊刘贬曹的情况已露端倪，如习凿齿《汉晋春秋》云：“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4]卷八十二《习凿齿传》、2155但从总体上是肯定曹操平定天下的功劳及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风格的。这只要翻看《三国志》、《晋书》的有关传、纪就可看出，因为不是本文的题旨所在，就不再赘述。这里举两则文学家对曹操的评价，西晋文学家王沈云：“御军三十余年，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术，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5]《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54指出其鞍马间赋诗皆能入乐歌唱，语含褒赞。被钟嵘评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在《吊武帝文》一文中目睹曹操遗令，而“慨然叹息”，叹其“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伤其“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人世无常，英雄亦难逃自然规律。但对曹操的功绩作了热情的褒扬：“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剪焉而后绥。釐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纲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彼人事之大造。”[6]卷六〇、833—844

东晋虽与西晋在接受曹操时有所不同，但北伐之议时有发生，所以魏武的兵法战略为时人所重。曹操的个性简率通脱与晋人的放诞真率颇有相通之处，且此时正统观念较为淡薄，尊君保国的观念还不流行。元好问《论诗绝句》有云：“邺下风流在晋多”，实为有识之见。

然而,降至南北朝时期,南朝人以正统自居,本能地对于篡汉的曹操评价发生转变。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曹操作品的评价只有一处,即《乐府》篇云:"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作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所说"北上"诸作,指曹操《苦寒行》等诗篇,显然持否定态度。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谈及建安文学时没有论及曹操。萧统《文选》只选曹操两首乐府诗,一为《短歌行》,一为《苦寒行》。较为保守的北朝人颜之推对曹操本人提出非议,《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云:"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讥,非懿德之君也。"[7]222因人废诗本是中国古代评价体系中的传统,南朝人对建安文学总体上持认可态度的同时,曹操慢慢淡出了他们的视线。

这种评价延及唐代,就连对曹操大为称扬的唐太宗①亦云:"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又怎可以身为训?"[8]《诚信第十七》,188朱敬则在《魏武帝论》中云:"观曹公明锐权略,神变不穷,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听不惑,临事决机,举无遗悔,近古以来,未之有也。"推崇之余却又批评道:"救弊即可,仁则未知。"[9]卷一百七十,1736—1737

至宋代,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对于曹操的其人其诗均评价很低,以忠奸为标准定曹操诗之高下的情况颇为普遍。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称《短歌行》"虽有意绪,词亦钝朴矣"。陈严肖《庚溪诗话》卷上云:"魏武、魏文父子,横槊赋诗,虽遒壮抑扬,而乏帝王之度。"大儒朱熹《论文下》言曹操作诗必说周公,"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曹操)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宋代对曹操颇多贬词,甚至直呼其为"贼",反映出宋儒对曹操政治评价持批判态度,因为在宋人眼里曹操显然不符合宋儒对人的道德评价标准②。

元代刘履《选诗补注》卷二亦认为曹操"周公吐哺"之句,"为王室致士,特为倾汉计耳"。依然是站在封建正统观念上对曹操加以指责,这恐怕与宋末理学复振有关。

明代以后对曹操诗的评价有所改变。大抵时代已然不同,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思想逐渐解放了,对于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越来越淡,加之年代渐久,对于篡位的批评似乎不那么强烈了。这时候一方面,批评家从诗艺的角度上认为,"鞍马间为文"的曹操终究显得粗疏,所以对曹操还是时有非难。杨慎认为其《短歌行》"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升庵诗话》卷三)。谢榛则认为其《短歌行》繁冗不精炼,同意欧阳询《艺文类聚》将"去其半,尤为简当"的看法,并举刘才甫之评论证曹操此诗"意多不贯"(《四溟诗话》卷一)。或仍用正统观念非议曹操,如朱嘉徵《乐府广序》卷八《魏风相和曲》云:"(曹操)但托喻周公吐哺,以西伯自处,举明辟付之后人,此为英雄欺人。"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云:"孟德以倾汉为心,其藉口周公,不异王莽。"这与宋人的正统派观点颇类。

而另一方面,一些批评家能从曹操的创作实绩出发,对其作出肯定评价,并且评价越来越高。试举例证之。胡应麟曾肯定了其开启魏诗风气的作用,并认为:"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诗薮》外编卷一)钟惺和谭元春这两位"性灵派"诗论家对曹操大加褒扬。如谭元春云:"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其王;有菩萨气,而不必其佛。'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吾即取为此老诗品。"钟惺云:"曹公心肠,较司马懿光明些,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明明供出,读其诗知之。""老瞒生汉末,无坐而臣人之理,然其发念起手,亦自以仁人忠臣自负,不肯便认作奸雄。如'瞻彼洛城郭,

① 唐太宗曾正面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其《祭魏太祖文》云:"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既而三分肇庆,黄星之应久彰;卜主启期,真人之运斯属。"(《全唐文》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

② 整个宋代,只有敖器之较为特殊,他在其《诗评》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亦是真心真话,不得概以'奸'之一字抹杀之。"(《古诗归》卷七)不仅充分肯定其诗中的王霸之气,并且通过品读其诗句用意为曹操正名。

明清两代对于曹操其人其诗的评价,从总体上称扬肯定的属于大多数,为简明起见,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二对其《苦寒行》一诗所作的评价可为代表:"后来杜公往往学之。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直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意满。后惟杜公有之。可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曹操的诗经过一千多年岁月的洗礼与检验,在读者的肯定与否定,称扬与贬斥中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

回顾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史,对于曹操诗的评价是有变化的,从总体上来说,诗论家们越来越挣脱正统观念看待曹操及其诗,且并不局限于其五言诗,而是观照曹操的所有诗作。但是不难发现,钟嵘对于曹操"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的评价是确当的,后世的批评家并没有十分突破他的这一判断。而且细心一点还可以注意到,对于钟嵘《诗品》关于曹操的品第有非议的是少数派,这似乎可以反证钟嵘将其列入下品的做法在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眼里是受到认可的。我想较为圆通的理解是充分肯定曹操诗的成就,准确给其定位,承认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包括其散文),甚至我们可以对古代诗人等次进行重新品定。与此同时,要看到钟嵘对于曹操的品评是确切的,对于其品级的定位也是符合钟嵘的美学标准和当时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的。

参考文献:

[1] 曹旭.诗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 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颜之推.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 吴兢.贞观政要[M].长沙:岳麓书社,2000.
[9]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Why Cao Cao was in the Third Level in Zhong Rong's Shi Pin

Qu Jing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the chief leader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Jian'an(建安) literary, Cao Cao (曹操) has been highly estimated for his achievement in literature. However, his poems was ranked the third lever in Zhong Rong's Shi Pin and caused debates among critic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ncluded it as below: Zhong emphasized on Dancai (丹采) more than Fengli (风力) while the poems of Cao are not up to the standard. Zhong discussed only the five-word poem (五言诗) while Cao's excellence poems were the four-word poem. Zhong talked over poems that were not aimed for singing and written by poets while Cao's poems were Hanyin (汉音). Zho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literature works while later generations mainly recognized Cao as a famous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who wrote at his spare time. The critics who object Zhong's evaluation on Cao are definitely in the minority. It provides the counterevidence that Zhong's comments are approbated by later critics.

Key words: Cao Cao; Shi Pin; five-word poem; literary poem; literary reception history

(责任编辑　管　琴)